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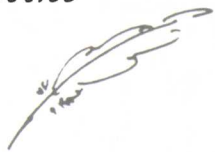


中西语言诗学

基本问题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n Basic Top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nguistic Poetics

赵奎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

中西语言诗学

基本问题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n Basic Top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nguistic Poetics

赵奎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赵奎英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04-8026-6

I. 中… II. 赵… III. 诗歌—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I207.22 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4900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郑成花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2.25

插 页 2

字 数 530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赵奎英博士最近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凡 45 万字，不仅篇幅可观，而且学术分量也颇为厚重。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部在中西文学理论研究上有着重要突破的论著。尽管奎英博士与我的师生关系似乎使我不应将话说满，但学术评价的客观性又要求我讲出应该讲的东西。

我觉得这部著作有着许多创新之处。首先，它突破了长期几成定式的从“道与逻各斯”对立构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而是从“名与逻各斯”出发对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进行整体架构，如果说西方哲学文化是围绕着“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展开的，那么中国哲学文化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如果说西方的哲学语言观是从“逻各斯”入手认识语言的，可以概括为“逻各斯语言观”，那么中国古代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则主要是蕴含在“名”这一概念之中的，可以概括为“名言观”。其次，是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有没有本体论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打破某些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本体论的看法，认为根据中国古代文献对“本体”一词的运用以及道家对“名道”关系的认识，中国古代没有西方那种纯粹的逻辑本体论，但有现象化和逻辑化相统一的、以混沌中和为本质特征的“无名本体论”。再次，是对于中国古代重时间轻空间的观点给予了反驳，认为诸种文化现象都表明，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浓郁的“空间方位情结”。

作为一名年轻学者能在以上方面有新的突破，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我认为最可贵的是，赵奎英科学研究中所坚持的不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说”，甚至是“对着说”的独立学术立场。众所周知，新时期 30 年，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对于我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话语重建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 30 年来，我们在西方文论的引进上所存在的仍然是一个结合中国实际偏少的问题，这就不免食洋不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论自我建构的进程。因此，当前的问题是，我们一方面不能停止对于西方文论的引进步伐，但更加重要的则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对话与建构。因为西方文论说的再好，都是从西方的实际出发的，总体上更加适合西方的国情与文化，而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与文化。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其保持适当距离，与之进行对话，通过对话进行建构。赵奎英恰是主动地做到了这一点。她在《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就是以中国古代的“名言说”与西方的“逻各斯”理论进行对话比较的。在这里，赵奎英还突破了在新时期几乎已成定见的“道论说”，这也是我国西方文论研究的名家所言，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学说。但赵奎英发现了“道论说”只能包含道家语言文论而不能包括儒家文论的弊端，而“名言说”却既能包含儒家又能包含道家，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因为道家重道但反名，而儒家重名却同样重道。这也许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但赵奎英自身论述的逻辑自恰性还是非常明显的，从而使得这一理论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再就是她对于我国古代哲学“无名本体论”的表述也是包含着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无名”不仅与“逻各斯”相对，而且也能包容儒道。另外，赵奎英关于中国古代时空观的见解，也是很有道理的。中国古代学说正是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此背景下构成“天地人”三才的变易之学，内中所包含的特殊的时间与空间的相互渗透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种时空观是中国特有而不同于西方的。而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名言说”、“无名本体论”，还是空间本位基础上时空渗透的宇宙观，都对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生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赵奎英从这一角度对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诗学理想等进行理解和阐释，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最后，赵奎英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语言学转向”以来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诗学的两大转向进行梳理，对中国传统语言哲学、诗学的思维方式根源进行剖析，并试图将中西加以汇通，构建新世纪包含中西的语言学理论，这也是非常可贵的。指出新世纪文论建设之路，正是我们目前非常紧迫但却做得十分不够的课题。当然，这种建构到底是以西方理论为基础呢，还是以中国本土理论为基础呢？到底如何将古代的理论加以现代改造呢？似乎

有点语焉不详，但毕竟是已经提出了西方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以来所出现的“诗化”与“空间化”转向，与中国古代的“诗化”与“空间化”倾向之间的汇通。也许赵奎英自己觉得还没有完全的把握，其实这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课题。但我觉得完全可以借用梁启超关于一种新理论的创造可以“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以及中国古代关于“旧瓶新酒，新瓶旧酒”的观点，大胆提出创新，不断完善。

本书据我所知在评审过程中得到评审专家的充分肯定，这也许包含了大家的许多鼓励，但赵奎英的成果本身所反映出来的刻苦钻研的精神，比较深刻的哲学理论思考与相当的学术水平则是不容忽视的。我又一次看到了赵奎英的进步与努力，而且这是在她承担着繁重的养育幼子的家务重负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就显得更加可贵了。当然，本书作为语言诗学似乎还应该结合一点中西文学作品，而在“后现代”网络文化与影视文化勃兴的背景下语言的多样性也是应该加以考虑的，而且解构论者的“文字中心主义”是否真正行得通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些问题，只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思考，对于研究语言诗学已经有十多年的赵奎英来说也许不成为问题，但还是可以再做思考的。

转眼间奎英博士毕业已经将近10年了，10年来奎英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得到学术界同仁的肯定和关爱，本书所达到的水平正说明了这一点。由此，我也真的看到了学术后浪推前浪的必然趋势。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有多高的修养就能做多高的学问，人的修养是无止境的，所以学问也是无止境的。但愿在治学的道路上奎英在学养上下更多的工夫，绝不满足一时一事的成绩，而是志存高远，达到更高的境界。我写了以上的话，作为与奎英的共勉也作为本书的序言。

曾繁仁

2008年12月11日夜

目 录

序.....	曾繁仁(1)
引 论.....	(1)
一 对象与范围.....	(1)
二 基点与框架.....	(9)
三 结构与方法	(18)

上篇 名与逻各斯:中西语言哲学与 诗学精神基点比较辨析

第一章 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与中国

古代的“名”言观	(29)
第一节 逻辑语言观与“逻各斯中心主义”	(30)
第二节 “名”言观与“重名主义”	(43)
一 “名有三科”与逻各斯之两义	(43)
二 名即“名一分”与逻各斯的“理性、逻辑”本质.....	(48)
三 “名谓书字”与逻各斯的“言说”原义	(60)
四 “重名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	(74)

第二章 逻各斯与上帝的合一与有名无名的悖反

(78)

第一节 “太初有言”:逻各斯与上帝的合一与逻辑本体论.....	(79)
---------------------------------	------

第二节 “中和无名”:有名无名的悖反与无名本体论·····	(90)
一 有名无名的悖反与逻各斯中心·····	(90)
二 道家的无名本体论·····	(92)
三 儒家的“天不言”与道家的“道不可名”·····	(106)
四 魏晋玄学对儒道冲突的融汇与无名 本体论的确立·····	(115)
五 “道大无名”与混沌、中和之境·····	(122)
第三章 逻辑地言说与诗化地言语·····	(136)
第一节 逻各斯中心与逻辑地言说·····	(137)
第二节 有名无名的悖反与审美言语的超越·····	(141)
一 道家的道言悖反与审美超越·····	(143)
二 儒家的“天不言”、“言不尽意”与审美超越·····	(153)
第四章 “逻各斯”语言观传统中的西方“纯诗学”与“名” 言观视野中的中国“大诗学”·····	(165)
第一节 “有韵的逻各斯”与逻各斯语言观传统中的 西方纯诗学·····	(166)
第二节 “有象的道”与名言观视野中的中国“大诗学”·····	(183)
一 “名与象”与“文与象”·····	(183)
二 “象与道”与“文与道”·····	(203)
三 “名与分”与“文与教”·····	(214)
第五章 西方传统诗学的理性“真理”指向与中国 传统诗学的混沌“中和”境界·····	(224)
第一节 逻辑本体论与西方传统诗学的理性“真理”指向·····	(225)
第二节 无名本体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混沌“中和”境界·····	(241)
一 中和无名与圣人理想·····	(242)
二 诗文礼乐与“成人之行”·····	(249)
三 “礼乐交错”与有名无名的悖反与调和·····	(253)

四 混沌“中和”与中国诗学的理想境界·····	(260)
五 “中和”境界与“大美”理想·····	(272)

第六章 西方传统诗学的逻辑体系与中国传统

诗学的诗化形态·····	(279)
第一节 逻辑的言说与西方传统诗学的逻辑体系·····	(280)
第二节 诗化的言语与中国传统诗学的诗化形态·····	(290)
一 “言无言”与“不言诗学”的诗性空间·····	(291)
二 “言象言”与“意象诗学”的诗化表达·····	(299)

下篇 诗化与空间化:中西语言哲学与 诗学当代汇通基础考察

第七章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与中西语言哲学与

诗学的当代汇通·····	(319)
第一节 “逻辑语言观”的解构与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 哲学与诗学的诗化转向·····	(320)
一 从逻辑语言观到诗化语言观·····	(320)
二 诗化语言观的转向与对逻辑语言观的解构·····	(324)
三 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的诗化转向 与中西语言诗学的当代汇通·····	(360)
第二节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与西方后现代语言 哲学与诗学的空间化转向·····	(379)
一 逻各斯语言观与“时间化”传统·····	(379)
二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空间化”转向·····	(394)
三 空间化转向与“空间化诗学”·····	(427)
第三节 中国语言哲学、诗学的空间化与诗化倾向与 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思维的当代汇通·····	(439)
一 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诗学的“空间化”与“诗化” 倾向的宇宙时空意识根源·····	(440)

4 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

二 西方语言哲学、诗学的空间化转向与中西语言

哲学、诗学思维的当代融塑 (475)

参考书目 (487)

后 记 (502)

引 论

一 对象与范围

在本课题的写作过程中，我不时地想起为海德格尔所看重的荷尔德林的两句诗：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因此人被赋予语言，那最危险的财富……^①尽管写诗与做学问不是一回事，人们在理论写作时遇到的语言问题也与诗人的语言经验大为不同，但我还是不断地顽固地想到它。因为我从来没有像今天涉足这一领域时那样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运用语词的“风险”。有许多思想家是反对被归类的，但如果我们不把它安置到一定的思想谱系之中就无法对它进行清晰描述，有许多思想家的思想是无法用“本质”、“本源”之类来概括的，但如果我们不给它这样一个词语，我们就找不着更好的词语。原来那些司空见惯的概念如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本体”、中国“诗学”之类在今天看来或许都成了问题，原本那些已经流行的说法如“中西比较诗学”之类在今天看来也都可能引起人们的质疑。尤其是在余虹先生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进行雄辩的分析论证之后，^②当我们再如此笼统地使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之类的字眼时，更是让人感到如步雷区。何况我们又给自己增加了另一重困难，提出“中西语言诗学比较研究”的问题。但如果真像余虹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

① [德]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35 页。

② 参见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引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另参见余虹《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载《思想战线》2005 年第 5 期。

学是不可通约的，我们不能把中国古代“文论”称为中国古代“诗学”，不能把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称作“中西诗学比较”研究，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用一个“共名”称呼我们目前所从事的东西？因为人们总是不方便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类似“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那样的分立性说明。我们曾尝试把自己的课题命名为“中西语言诗学文论比较研究”，或“中国语言文论与西方语言诗学比较研究”，但感觉这样的命名既不比现在的说法在语义上更加明晰，而且在形式上也实在拗口。既然此路难通，我们只能再次冒险使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一语，并力图为这种说法的合法、合理性寻求依据。

实际上，这类寻求依据的工作早已经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以及“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一些先行者做过了。如黄药眠、童庆炳先生主编的《中西诗学比较体系》^①，曹顺庆先生的《中西比较诗学》^②，张方先生的《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③等，都对此类问题进行过正面说明。我们这里想继续说的是，余虹先生主张为中国古代“文论”正名，强调“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并对中国古代“诗学”这一命名背后所隐含的东西进行反思，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他让我们在进行中西比较时再也不能未加反省地使用任何概念术语。我们目前在自己的课题研究中没能贯彻这一思想成果，并不是完全无视这一思想成果的意义，而是一是感觉到强调“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完全“不可通约性”的观点尚具有极端化的地方，因为如果两种东西是完全不可通约的，对它们的比较就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二是感觉到主张在完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论”概念，反对把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称作“中西诗学比较”的做法在操作上也有些“虽高不行”。因为任何一个在遥远历史中产生的语词，都很难在今天的语境中完全按它的原意来使用，任何一个在异质文化中孕育出来的概念范畴都很难正好与本民族文化中的相关概念完全对等，如果我们因此完全放弃以一方文化中的已有概念描述另一方文化中大致相近的概念或名称的话，不同民族的文化交

① 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诗学比较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② 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③ 张方：《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引言”，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流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以西释中”或“以中释西”的情形都时有发生。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有“诗学”（poetics）的概念，有“文学批评”（literature criticism）的概念，有“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的概念，有“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概念，却并没有一种叫做“文论”的东西，但中国学者却习惯于把上述诸种概念统称为“西方文论”，“西方文论”这一称呼不仅仅是从西方语境出发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简称，它实际上也带着仿照“中国文论”来理解“西方诗学”的印痕。同时，如果说把中国“文论”看成中国“文学理论”的简称已经出现了错误，那么这种错误不是从把“文论”称作“文学理论”开始的，而是从把中国古代的“文”称作为“文学”就已经开始了。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语境中的“文”、“文学”概念，是不同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的。如果说我们能把中国古代的“诗”、“文”、“词”、“赋”等并未被古人直接名为“文学”而是被视作广义之“文”的语言作品称作今天意义上的“文学”，那么我们把古人论说这类语言作品的语言文字称作“文学理论”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了。如果我们无法从根基上质疑并扭转“文学”这一已经出现了错位的称呼，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扭转由“文论”向“文学理论”的衍变和过渡？既然中国古代的“文”可以称作“文学”，“文论”也可称作“文学理论”，而“诗学”又可作为“文学理论”的代称，从中国古代“文论”向中国古代“诗学”的过渡似乎便水到渠成。

把“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代称的确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概念有直接关系，但由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并非没有“诗学”这一名称，用“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代称，也并非与中国古代文化语境完全无关。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元代杨载有《诗学正源》、清代汪师韩有《诗学纂闻》等。这说明中国古代即有“诗学”一说。只是这里的“诗学”就像余虹先生所说的，它指的是有关与“词”、“赋”、“曲”、“史”等并列的狭义之“诗”的“学问与知识”，它既不等于古代“文论”，也不等于西方“诗学”（poetics）。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诗学”“乃某一文类之学”。^①

^① 余虹：《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载《思想战线》2005年第5期。

但我们还知道,“诗”是中国文学的经典形态,《诗》被尊为“经”。还不仅如此,皎然在《诗式序》中曾经说:“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①如果说作为“‘六经’之菁英”的“诗”作为文学的代表当之无愧,那么我们借用中国古代已有的“诗学”概念作为广义的中国“文学理论”的代称,或许也能反映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实情。即便退一步说,“诗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并非没有任何正面的积极作用。因为使用中国“诗学”这一命名,可以更方便与西方“诗学”进行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我们既可以通过对共同概念的不限定,更清楚地彰显在中西“诗学”这一共同名称之下所涵盖的不同内涵,而且共同名称的使用,也可以使我们更方便地说明中西诗学的某些可能的汇通。再者,我们在名称概念的使用上,一方面需要保持足够的清醒,知道自己始终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术语的;另一方面也许没有必要过于拘泥,适当借鉴一下道家的语言观,可以使我们拥有一片更为开阔的天地。按照庄子关于“道”所说的,“道之为名,所假而行”(《庄子·则阳》),无论是称作“诗学”还是命为“文论”,都是我们为了方便与西方诗学进行比较而设立的“名称”,既然我们已经清楚地理解了它们的所指,知道我们这里所说的“诗学”就是指“文学理论”,它与“文论”是通用的,已不至于引起理解上的混乱,也就没有必要再过多地纠缠于这些概念本身。只有从这一概念出来,我们才可能进入对另一个更为关键的概念“语言诗学”的解释和说明。

如果说“诗学”这一概念既来自西方传统,又与中国古代文化语境相关,那么“语言诗学”同样具有这种混合身份的复杂情形。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诗学”是在最广意义上来说的,它泛指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或对文学语言具有较高程度的自觉或表现出某种特别关注的文学理论。狭义上的“语言诗学”,实际上是在20世纪初的西方随着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而兴起来的,它的原名应该是“语言学”与“诗学”结合而来的“语言学诗学”(linguistic poetics)。狭义上的“语言诗学”是与狭义上的西方形式主义即“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相当的。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是与较广意义上的西方形式

^① 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主义诗学相当的。较广意义上的西方形式主义诗学一般是指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诗学。但由于后结构主义诗学与结构主义诗学一样都是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发源的, 尽管后结构主义诗学与结构主义有着诸多不同, 但在强调语言文学的“空洞性”上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因此它也是可以归入这种较广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诗学之中的。自 20 世纪西方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以来, “语言诗学”可称得上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显学”。但“语言诗学”之所以能称得上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显学”, 不只是因为“最狭义上”的、也不只是因为“较广义上”的形式主义诗学都受到语言哲学观念的影响, 具有高度自觉的语言意识, 特别关注文学语言问题, 而是因为对语言的关注乃是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个突出的普遍的倾向和兴趣。

尽管狭义的“语言诗学”术语发源于俄国形式主义, 对语言的关注在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但并不能由此说“语言诗学”这一文化事实, 只是在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才存在的。因为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事实”, 所以人们的文学观念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定时代、特定地域或民族文化中的语言哲学观念的影响。人们的“语言观念”往往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文学观念”, “语言哲学”往往直接影响着“诗学”的生成方式, 人们最初的对于文学的看法往往直接联系于或者就是他们对语言的认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 一直都存在着一种语言论视野, 一种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思索或研究的诗学运思方式。如中国古代《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 歌永言”的命题, 这一观念也铭刻在“诗”这一汉字的构字法之中。“诗”古文作“𠂔”, 也可作“誌”。拆开来看, “诗”(“誌”)也就是由“言”和“志”构成。而中国古代在探讨“诗”“文”为何物这一问题时, 遵循的也正是这种从“心”到“言”再到“诗”(“文”)的思路。《毛诗序》中有: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 “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朱熹说: “诗者, 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诗集传序》) 孙复也说: “文之作也, 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答张洞书》) 这诸种看法都表明了“语言”是诗文得以“成”“立”的根据, 人们往往是从语言入手谈文学的本质或发生问题的。在中国古代文论中, 不仅在文学观念上具有语言论的视野, 而且还存在着许多关于文学语言

的见解，并且对文学创作或理论写作中的“言不尽意”问题具有高度的自觉。中国古代文论对于语言问题的高度自觉，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对于语言问题的高度自觉，中国古代文论对文学的看法也正与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观念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在一种语言哲学视野中生成的，它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语言诗学”。尽管中国古代对于语言的局限性比起西方传统具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但仍然不能离开语言来谈论文学的本质或发生问题。语言就像不可逾越的魔障，无论是抬高它还是贬低它，无论是崇拜它还是憎恨它，但都无法最终绕开它。“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老子》二十章），也没有谁能够完全抛开语言来谈论文学问题。尽管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没有谁直接说过“文学”就是“语言艺术”，但却一直蕴涵着文学是“语言艺术”的道理，尽管更没有谁直接说过“文论”就是“语言诗学”，但却一直包含着一种从语言入手认识文学的“语言诗学”的思维方式。

在西方诗学传统中，诗学与语言哲学更是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中，曾提出他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并以此为坐标，梳理出西方诗学史上四种文学批评的主要模式：摹仿说、表现说、实用说、客观说。在艾布拉姆斯列出的这四种批评模式中，没有哪一种不是伴随着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理论兴起来的。^① 古代摹仿说与古老的“词物对应论”和语言起源上的“拟声说”，实用理论与古代修辞学，表现理论与18世纪的语言起源论上的“感叹说”，客观理论与20世纪的语言哲学，都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语言哲学观念、语言学研究不仅为文学批评提供方法论工具，而且语言观念的变革本身，也往往正是文学观念、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变革的重大促进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受到语言哲学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现象在中西历史上自古就有，一部“文学理论史”几乎就是一部“语言诗学史”。只是从古至今的语言观念不同，人们对语言地位的理解不同，从古至今的“语言诗学”也不相同。当哲学家把语言的地位贬得很低时，语言在相应的诗学理论中的地位也不会高。这时即便从语言角度

^① [美]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郇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章。

切入文学研究，人们也不会觉得它是一种“语言诗学”。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以来，西方的哲学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语言由思维和认识的工具变成了思维和存在的本体，文学语言也由传达文学内容的媒介上升到了文学活动的本体，文学语言变得空前重要，文学研究也几乎成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结合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学术努力，“语言诗学”也因此具备了前所未有的鲜明形态和意义，人们便以为只是在这时才出现了那种可称作“语言诗学”的东西。

但我们认为，这只是狭义上的语言诗学。最广义上的语言诗学，没有时代与国别的限制，是贯穿在整个中西文学理论史之中的。尽管在中西历史上，由于不同的时期对语言的关注程度不同、不同的理论家语言观念的不同，其对文学语言的看法与关注程度也是有差异的。但从总体上看，我们所说的那种最广义上的“语言诗学”，亦即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或对文学语言具有较高程度的自觉或表现出某种特别关注的文学理论，一直是存在的。只是由于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的发生，在20世纪西方的形式主义诗学中，“语言诗学”的形态也表现得最为明显罢了。我们也正是通过这种狭义上的“语言诗学”形态才看到了最广义上的“语言诗学”的存在。我们这里所说的“中西语言诗学比较研究”，也正是针对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诗学”来说的。这种最广义上的中西语言诗学比较研究，在研究范围上与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范围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因为我们几乎看不到哪个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是不关注语言的，几乎看不到哪个重要的文学理论家的文学观是没有受到某种语言观念的影响的。只要我们研究文学理论，几乎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要研究“语言诗学”，就像只要我们研究文学艺术，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语言艺术”一样。正是由于“语言诗学”存在的普遍性，使我们在课题的行文中，反而没有时时使用“语言诗学”这一名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课题直接称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而是在总标题上冠以“中西语言诗学比较研究”？“中西语言诗学比较研究”这一称呼，既标明了一种研究对象的范围，也标明了一种研究问题的视角。它一方面标明中西诗学的生成都受到语言哲学观念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标明我们对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不是一种普泛意义上的比较研究，而正是从语言哲学这一特定角度切入的。